



被誉为“全世界教育之父”的
安德里亚斯·施莱歇尔教授 (Andreas Schleicher)
写序推荐

创新 中国 教育

一位耶鲁毕业生告诉你如何考取国际名校
讲述发生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深圳中学创新教育的故事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成功探索



(加拿大) 江学勤◎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创新 中国 教育

江学勤◎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新中国教育 / (加拿大) 江学勤 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17-2072-6

I. 创… II. ①江…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509 号

创新中国教育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6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198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001

序言 /009

第一章 耶鲁之路 /013

第二章 从北京开始 /029

第三章 新的旅程——深圳 /044

第四章 筑梦 /059

第五章 回到起点 /075

第六章 重拾信念 /094

第七章 教育新实践 /108

第八章 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 /124

第九章 中国创新阶层的未来 /143

附录：学生来信摘编 /171

写在前面的话

2008年8月我刚满32岁。32岁，对大多数的男人而言，正是他们在生活中放缓脚步，感受生活带来的甜蜜与稳定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业，事业也如日中天，他们与心爱的女人结了婚，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孩子。但我的32岁，却仍孑然一身，漂浮不定。自从1999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中国曾经当过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也曾在阿富汗当过联合国官员。这些都是我擅长的理想的工作，但是它们在我心中并没有显得弥足珍贵，它们也无法再激发我的想象力，因为从事这些工作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我跟它们一一道别了。

在32岁来临之时，我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我却坚定地想为这个世界带来些许不同，为我身边的

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曾经是我从耶鲁毕业时怀揣的梦想，但在十年后我才发现也许自己才是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和我的父母一起住在多伦多；我每天会骑着自行车环绕整座城市；也每天阅读，坚持健身。对于这样的生活我很是满足，看上去也似乎没有任何值得我抱怨的理由。可在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了矛盾与迷茫。我的心中似乎有着一个缺口，而它每天都在不断地扩张着。

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中国的、将会立刻为我的人生带来惊喜与转折的邮件闯入了我的世界。它来自我的老朋友王铮，当时深圳中学的校长。1998年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曾请了一个学期的假到北大附中任教，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那时候，年轻的王铮是一位满怀理想主义的副校长，而我——一位年轻的老师，和王铮副校长一样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好朋友，并时常讨论要如何携手合作改革中国的教育。可当时北京学校里陈旧的教育系统几近无坚不摧，注定了我们的理想也只能纸上谈兵。早在1998年，学校都只为考试而教学，面对着如此残酷的事实，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只能是空谈，我和王铮都无能为力。后来，王铮选择到了中国的南方——深圳去尝试实施他的教育改革，而我则当了几年的记者。

虽然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我时常会想起王铮；想要到中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愿望纵然已经被埋葬在我的内心深处，但它生命力顽强且精力旺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收到了王铮的邮件，得知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们一起去合作对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革的消息后，我毅然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往深圳去拜访他。

王铮是对的。2008年中国的教育现状与1998年时的情况大有不同。2008年，逐渐开放与繁荣的中国，开始追求国际化与现代化，尤其是在教育系统方面，因为这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的最重要要素。这意味着在中国会出现这样一个全新的局面：中产阶级的家庭将会选择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甚至读高中。2008年，深圳中学的

800多名毕业生里有10%的学生申请了美国大学，这是一个出现在多数中国顶尖高中里的一个真实百分比。在这场逐渐掀起热浪的出国潮中，我和王铮都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机遇——建立新的课程体系，以此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学生都只看重托福（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和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考试。他们愿意利用三年宝贵的高中时光疯狂地背单词并参加新东方的培训课。

培养学生进入优秀的美国大学，固然是我和王铮共同的愿望。但它却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希望培养具有全球意识、能关注社会，并善于思考与领导的学生，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更能致力于为中国和世界更好地发展而贡献力量——我们希望培养中国创意阶层的先锋。而正因为没有太多人会与我们所想的一样，所以我们更加义不容辞地想要告知世人，要在中国的学校里进行改革是有可能的。王铮和我在接下来的四年间携手合作，在中国建立起了两个创新的出国留学项目。2008年9月至2010年7月，我们在深圳中学为学生建立了出国体系，一个旨在培养深圳中学的学生成为创新合作的人才，帮助他们在美国大学以及未来在全球领域里能获得成功。我们的学生创办并管理了中国高中里的第一份日报、第一家咖啡屋，以及一个英文杂志社。2012年他们纷纷拿到了耶鲁大学、沃顿商学院、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西北大学、范德堡大学，以及埃默里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那时开始就有一些学生开始给王铮和我写信，告诉我们出国体系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尤其是出国体系给予了他们自信，鼓励他们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大胆拥抱、适应全新的环境，并始终带着自信与活力不断地挑战自我。

2010年王铮被邀请回他的母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任校长。从2010年7月到2012年7月，我们再一次合作创立了国际部，致力于培养学生拥有全球及社会意识——这个使命，我们也同样达成了。

北大附中国际部作为中国第一所高中将学生们送到非洲（博茨瓦纳）以及中东（以色列）开展交流活动；2012年6月，我们一同飞往了广西朔朔，用一周的时间在当地教贫困农村的小孩读书。2013年9月，我们第一届的学生也将抵达美国大学的校园，我和王铮对他们在那里即将发生的故事充满了期待。

《创新中国教育》这本书见证了我和王铮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深圳中学建立了出国体系，在北大附中建立了国际部。我写这本书是想让中国的家长、老师、学生以及更多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人们明白，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改革如此重要，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书中记下了我们的成功与成就，但更多的是它很真实地坦言了我们的失败、挫折与挑战——直至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失败远比成功多，而这是任何一场改革的征途中所必经的过程。

纵然你和王铮都非常明确我们的改革目标，也成为了改革路上的开拓者，但我们依然不知道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不知道改革是否可行。我们只是感觉此时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挑战中国教育的现状。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在这个过程中犯下许多错误，也会经历许多痛苦。为了向加入这场改革的所有学生、家长和老师保证公平，我们决定从第一天开始就对所有人诚实、透明、公正地公开我们所犯的 error 和遇到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诺言，我们开会，也在每周给家长们写一封信，并与许多同学在晚餐上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刚开始，这种赤裸裸的坦诚着实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很多学生要么选择不参与，要么直接在中途转学离开。信任我们的学生会进入了美国大学以后，在回忆起与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岁月时，发现自己在国际部学到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改变的勇气与自信，并勇于坦诚失败、战胜失败。

尽管我们的学生们也学到了许多，但我自己才是这里面收获最大、成长最快的。这本书里有很大一部分详细地在阐述了我的个人与职业发展历程——因为在我和王铮一起为中国教育改革而奋斗的

四年里，我所经历的这场对自身的教育是我认为最好的教育。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里长大，我的父亲在饭店里做着薪资微薄的工作，而我母亲则靠为人缝补衣服赚取更少的收入补贴家用。我的头发是父亲帮我剪的；我穿的衣服是堂兄们留下的；放学以后，当我加拿大的同学们都在玩曲棍球、弹钢琴或是和家人一起滑雪的时候，我就坐在电视机前看卡通片。直到9年级以前我在学校里的表现都很差，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表现，我也从没想过要去读大学。我的同学和老师们认为我的未来也就如此了——终日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或许会比父亲做得好一点——因为社会经济局总会帮助我们。

然而9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只教了我们一周的代课老师。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她把我带到一边，用她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对我说出了让我无法置信的话：“你很聪明，也很有潜力，只要你投入去做，你能把事情做到最好。”于是在不久后，我就决定了要去常春藤盟校。三年以后的我如重生般脱胎换骨——我被耶鲁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在耶鲁毕业后我一心想回到中国，告诉中国的学生们那位代课老师曾对我说过的话。

但是当2008年王铮无条件地给予我支持与机会，让我得以开展自己的教育改革计划时，我却忘记了那位老师所说的话。刚开始，我认为自己对教育的意义清晰明了：它意味着让深圳中学的学生通过阅读提高SAT的成绩；它意味着为让学生们的简历豪华厚实所以得鼓励他们成为学生领袖；它意味着让学生们进入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好让我能证明自己一直都是正确的。可当我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时我才逐渐意识到，一味地追求结果与真正教育学生是相互冲突的。我也意识到，当我过于强调自己的利益——自我则轻而易举地把我蒙蔽了——最后我竟在无形中伤害了自己学生的利益。只有通过学会放下自我，并记起我的那位代课老师曾经说过的话——每个学生都具有潜力——我才能真正地帮助中

国进行教育改革。

这本书，无关其他，就仅是我个人在自我的旅程中发掘到的关于教育的真正意义。

* * *

从第一天开始，假如没有一群愿意无私奉献的优秀学生与伙伴，王铮校长和我就不能建立起这样的项目。没有这群人，这本书也不可能出版。

深圳中学的学生周业然、金小异帮助我们聘请了为出国体系教授英文研讨课的外教，帮助我们装修教室、培训出国体系的学生创办第一份深圳中学日报、管理一间咖啡屋、办好一本英文杂志。如今，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了。周业然在卫斯廉大学（在大三转学前他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金小异在汕头大学。而郑柏恒是我们出国体系第一届的一名学生，他自第一天开始就满怀信心与热忱地接受了我们所有的活动与课程。今年郑柏恒刚刚开始了他在西北大学的大一新生生活。无论过去或是现在，这三位在学业上表现极为出色的学生为深中、为出国体系、为我都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此次，他们更是参与了《创新中国教育》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周业然负责了本书第一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翻译，金小异翻译了第五章和第六章，而郑柏恒则负责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译。

当我和王铮建立起出国体系之后，我们需要聘请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在第一轮招聘中我们就找到了陈诺斯和李红，两位很有能力而且工作认真的女士，她们和我们一样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满怀激情。能遇上这样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是我和王铮的幸运，而更幸运的是她们甚至跟随我们一同到了北京。如果没有她们的经验与专业，没有她们的敬业与奉献，我们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建立起国际部——这确实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是如此幸运能拥有陈诺斯和李红这样的战友与挚友。没有她们，这本书

也只能是一沓稿纸。陈诺斯现在正在深圳一个出国留学体系里上班，那是一份全职的工作，但她依然利用空闲的时间帮我翻译了书的前言、第二章和第九章的内容，并参与了整份文稿的编辑。李红则担当了我的代理人，为出版这本书寻找出版社，并全程监督整本书的进度。

最后，我想要感谢王铮校长，我谨以此书献给他。他在我绝望的时候给我机会，让我得以追逐自己的梦想；他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改革者；无论何时何地，他对我都如此信任，耐心且勇敢地给予我自由和空间，让我不断学习、摸索对学生最正确、最好的教育！能与中国教育改革中最伟大的奉献者共事四年，我深感荣幸与自豪！我期待着某天我们能再一起携手合作。而在那之前，我希望《创新中国教育》能为我们妥善保存好这过去四年间我们一同取得的成就。

作者

(2014年3月于加拿大)

序言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全球化与现代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日趋多元化及相互关联的人群，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及大量即时有效的信息，都仅仅只是这些新需求中的少数代表。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改变人们生活及推动经济发展的是人的技能与创新能力。如果失去这一切，我们只能游离在社会的边缘，毫无活力地得过且过，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也无法转化为经济的增长，而国家也会在当今愈发依靠文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竞争中渐渐落伍。

其实这样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如今，技术与创新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也是作为积极上进、兼具社会责任心的公民为多元世界作出贡献，欣赏并构建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的主要动力。在

如此一个迅猛发展的多元化世界里，或许我们对事情的发展不再胸有成竹，或许外界新奇的事物常让我们感到震惊诧异，或许我们发现自己需要多向杰出的群体学习，又或许我们甚至会在前进途中犯下错误。这些原被定义为错误与失败的过程，若我们能用正确的心态解读，又何尝不是在激发我们学习新的知识与技术，促进自身不断的创新与进步呢？由此可见，无论是个人、群体组织，还是体系架构，要想在突发事件来袭时仍能屹立不倒，甚至还能促使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捍卫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地位，重视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与作用。而从总体层面而言，它们也为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必要的适应性、智力支持和积极的响应。

中国，如果我们仅从数量层面讨论，那么比起其他国家，它确实是在为更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出众的学历背景。但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培养出大量同质的教育产出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了。若是在三十年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会为学生们终身所用。而今天的学校，需要的是为了比以往更快速增长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为了尚未涉及的工作领域，为了尚未发明的全新技术，以及未知的社会问题而培养人才。

可我们又该如何去培养能积极面对未知挑战的求知者呢？教育者的困境是固定模式的认知能力，它是最易于施教和最易于测试的技能，也是最易于数字化、自动化和外包的技能。毋庸置疑，每个学科中已经建立和完善的知识与技能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富有创新或创意的人们的知识基础，他们通常拥有在某一知识或实践领域擅长的专业技能。而与之同等重要的是“学会学习”，人们在学习既有知识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而今，教育的成功不再是简单的学科内容复制，而是如何能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将其应用在全新的现实环境中。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不会再因为你知道什么而给出奖励——谷歌和微博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它看重的是你能否学以致用。这就是当今世界的要求，因此，当今教育需要更多的

是思维方式，这包括创意、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能力；它也需要更多的讲求工作方式，包括交流与合作；讲求更多的工作技巧：鉴别能力与开发新技术潜能；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情商与社交能力，它们可以为人们带来更和谐的生活，更融洽的工作。

一直以来，人们解决问题最传统的方法就是将难题分解为各个易于掌握的信息和片段，老师会将解决这些信息的技巧传授给学生。然而在今天，我们正是通过合成不同的信息或片段创造出了价值。这当中少不了好奇心，开放性思维，以及创建原本看似毫无相关的想法之间的关系网，也少不了人们开放、包容、熟悉地接纳并掌握未知领域的知识。人们如果终其一生都只投入在一个学科或领域中，那么我们将与富有想象力的技能失之交臂，从而也将失去了拥有不断研发创新的机会。

世界不再如从前一般刻意区分出专家和通才了。专家一般有很深的技能，但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被专业同行公认的价值又仅局限在该专业范畴内。而通才的视野虽开阔，涉及的知识领域宽广，但专业技能却相较薄弱。因此，当下越来越备受推崇的是能够在逐步发展的环境下应用深度的技能，建立发展新关系，并不断适应新角色的人才。他们不仅拥有不断更新、调整的能力，而且还能持续地学习和成长，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不断刷新自我定位。

同样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当可搜索和获取的知识越多，那么拥有获取信息内容之外的能力，及人们主动提出质疑以完善既有知识架构的能力就越显得重要。过去，当学生们需要某种信息时，你可以让他们在百科全书中搜寻答案，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找到的一定是正确的信息。而今天，人们对知识却有了全新的定义：知识是如何对自四面八方而来的信息运筹帷幄，是在互联网上通过超文本找到建立属于自己心理表征的信息，是处理、分析并解决网络上的模糊信息的方法。以前，文化教育主要是教会学生会阅读，这是每个人只需建立一次便可终身受用的知识系统，也可称之为技能。

但现在，文化教育关注的是为了不断学习而阅读，是拥有辨别、理解、分析、创造以及沟通知识的技能与积极性，是能将理论知识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环境相结合的能力。

在当今的校园里，人们最常见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学生各自独立学习，老师则会在学期结束之际，为他们各自取得的成就给予鉴赏与肯定。但随着世界发展愈发紧密依存，我们对擅长合作与协调的人才的渴求也愈发强烈。纵观当下，我们不难发现创新不大可能是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人们共同组织、分享及整合知识的成就。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今日我们所专有的知识都将在明日成为全世界共享的商品，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允许我们能将自身无穷的想象力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线性垂直控制或指挥所产生的价值也越来越少，相反，基于同一层面的横向协作才能持续产生价值。成功往往属于那些能适应，并精通全新合作方式的人士。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正在从曾经因为故步自封而使知识迅速贬值的状态，逐渐转变到一个充满开放与包容，并不断提升交流与合作能力的状态。

安德里亚斯·施莱歇尔教授（Andreas Schleicher）

（2014年2月于巴黎）

第一章 耶鲁之路

1976年，我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市。正是我的出生使得父亲放弃了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梦想，离开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里教数学和生物。每到晚上，他都借着烛光偷偷地读着那已经被翻破了的书，期盼着有一天高考制度能得以恢复，让自己有机会成为家中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毛主席去世后，我父亲成为了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并且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师范大学。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966年他高中毕业那会儿，我父亲或许会写下欣幸而自豪的信，寄给身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与美国的亲戚们。

可在1978年，父亲已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儿子，马上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快要出生了。他写信给亲戚们说，除了退学和移民多伦多以外，他别无选择。父亲心中无疑是想要光耀门楣的，可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时间里，